

## 消失的北京东直门外铁塔院铁塔

今北京东直门外曾经有一座“铁塔院”，院内有一座多宝佛塔。该塔院以铁塔、塔下的八角殿宇及殿内供奉的肉身佛而闻名。

明清时期的东直门外大街（现在的东外小街）是呈东北西南走向，居民和商铺密集的关厢地区就是沿着东外大街为轴心，两侧分布开来的。出了东直门城门，过了护城河桥，道路向北偏了接近45度，头1里左右最接近城门是关厢的繁华区域，商铺密集，被称为上关。过了这里，延伸出一条偏东北的胡同，使这个路口呈“Y”字形，故俗名岔子胡同，后改名察慈胡同。过了胡同口继续沿着东外大街前行，大概1里左右有一个高土坡地，从岔子胡同口到土坡一带叫下关，这一带房屋就相对稀疏许多了。过了土坡就算出了关厢地区，就是郊野了。土坡西旧名塔院，因记载缺失，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哪个寺的塔院，也不知道曾有多少塔，到民国时期只有一座铁塔存留了。

铁塔院在东直门外大街南侧，下关东头的土坡西侧，塔院坐北朝南。塔院建在土坡西侧的一个高地上，仅有一个院落，四周砖墙，院门开在西南侧，院落东西、南北各长36米。院子中后方有塔一座，从塔门偏西南院门方向有砖砌小路。院内有槐树两棵。无其他附属的建筑。塔结构特殊，由两部分组成，塔基是一座八角型的佛殿，佛殿顶部有一座小型铁塔。八角形佛殿为砖石结



1925年左右兰登·华纳拍摄的铁塔院铁塔照片

构，八角平顶，高5米左右，八个棱角垂直地面，殿前后有卷拱门，民国时期后门用砖封死。东西有卷拱窗。东西南北各面门窗龕门上各有石匾额一个镶嵌于塔上。其中正南石匾为“明万历四十七年，东镇护国永明宝塔，永明慧目，乾隆戊申立”。西面挂木对联一副，上书“遗迹北京留铁塔，显灵东镇落金身”，尾款“乾隆癸丑立”。联上另有加刻：“特授东城兵马司正指挥使张鸿侄男祖修重修”和“道光二十八年岁次戊申……遇参吉日……”。其他匾额没有记载，内容未知。塔顶各面有一圈女墙，每面女墙下各有两个石条制成的出水口，民国时八角殿西北和西面有破裂现象。八角殿顶部正中有一铁铸覆钵塔，塔身高3.18米，径1.30米，塔身西侧有小门，上有横匾为“千佛宝塔”，左有“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现祥”，右有“中州西平一

腊司本峰比丘铸造”字样。登台阶入八角殿门，殿内正中有一个砖砌佛龕，佛龕里供奉了一个“肉身佛”。看民国年间照片中，佛龕外侧装着玻璃，肉身佛位于砖砌佛龕之中，年龄似乎三十多岁，高颧隆鼻，嘴唇微张，穿着信徒供奉的五佛冠和袈裟，飘带上印有“中华民国十一年xxxx”等字样。殿内空间不大，除佛龕还有铁罄一口、香炉一个。当时负责管理铁塔院的僧人叫常海，因寺庙内除了八角殿并没有房屋，他也只能长期寄住路北关帝庙中。民国

时期，信众虽不知肉身佛的来历，但看其造型特殊，年代久远，仍常有人来祭拜，香火旺盛。每年的正月初一日和四月初八日，还有定期的庙会。新中国成立后，铁塔依然留存，但东直门外大街却几经变迁。在道路扩建中，大概在20世纪70年代铁塔院被整体拆除。因东直门一带道路改造太多，地貌变迁大，所以现在的位置不好确定，怀疑是东湖别墅东北外交公寓西南一带。

因东外铁塔院内八角殿匾额上有“万历四十七年”字样，笔者怀疑此塔建于万历年间，根据其他题刻，应该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道光二十八年（1848）进行过重修；八角殿之上的铁塔塔身有“康熙十九年铸造”字样，因康熙十八年（1679）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可能最初明代万历年间所建的塔，并不是现在的形状，原塔在康熙年间的地震中被破坏，现在的八角殿就是当年残塔的一部分，而康熙十九年（1680）改造了残塔为八角殿，并在殿上添建铁塔，这之后才有了铁塔和铁塔院这个名字。另外铁塔院西侧曾有一座崇宁庵，占地4亩，有房屋15间。虽然相邻，但创建年代不同，民国寺庙调查已经把她们当作两个不同的寺庙来登记，不知和铁塔院有否隶属关系？这些疑问因资料不全还没有准确的答案，期望将来会有更多的资料证据面世，解开迷团。

（韩立恒）



1930年左右海达·莫理循拍摄的八角殿内部供奉的“肉身佛”

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院落错落有致，彰显华贵气派。



拓片中可见“永济寺”字样

太监庙有个显著特点，即在建寺的同时，预建坟墓。也就是说，寺庙、坟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景聪墓也不例外。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景聪去世，葬于永济寺之西。当年九月初七日，弘治皇帝派礼部官员以及御马监太监张恕，到景聪墓进行祭祀活动。依据《大明会典》的规定，景聪应谕祭一坛，即仅谕祭一次。

入清以来，永济寺破败不堪。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永济寺仅存遗址。“文革”期间，笔者到永济寺遗址踏勘，见寺庙遗址之西有块石碑，砸得面目全非，只有“皇帝遗御马监太监张恕谕祭”几个字幸存，不禁大失所望。哪知翻过碑来一看，碑文基本完整，不禁大喜过望。

笔者将半个世纪前的拓片公之于众，相信读者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李新乐、李保宁）

## 为永济寺『正名』

以壁画闻名的模式口法海寺以东，有座永济寺，俗称涌泉寺，最近修葺一新，准备向游人开放。为此，还在模式口地区增设了路标指示牌。遗憾的是，路标指示牌将“永济寺”误为“永泉寺”，使游人受到误导。

永济寺和法海寺一样，是座太监庙。永济寺的创建者景聪，贵州人。贵州距离北京不啻千里，他如何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呢？此事须从成化元年（1465）说起。这年正月，朝廷派中军都督同知赵辅为征夷将军，与韩雍讨伐“两广蛮人”，攻克大藤峡。次年（1466）六月，凯旋班师，数千名瑶族俘虏同时被带回北京。在这批俘虏中，有不少男孩，景聪便是其中的一位。

据《御马监太监景公墓表》记载：景聪入宫后不久，便显示出他的聪明才智，在



修葺一新的永济寺

# 北京文物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双月出版）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6—L0023号  
◆2017年第2期（总第250期）  
◆2017年4月28日印刷  
◆印数：2000份

## 北京市政府组织召开全市文物安全工作会

4月21日上午，北京市政府组织召开了全市文物安全工作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领导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

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珠，北京市副市长王宁，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衡晓帆，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徐和建出席会议。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区政府主管文物工作副区长、各区文委主任和主管主任、市文物局直属单位负责同志、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使用单位和重点文物安全隐患管理使用单位负责同志及媒体单位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北京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舒小峰同志主持。

会议通报了明十三陵思陵石五供烛台被盗窃的相关情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物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对“全市文物系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同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文物安全管理责任，要求加大文物安全隐患排查力度，最大限度消除文物单位安全隐患，确保文物单位安全。



会议部署了“打击文物盗窃和非法交易专项行动”工作，公安机关将联合文物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特别是针对田野石刻等文物加强巡逻检查，狠抓盗窃、盗掘、破坏文物的行为，形成震慑效应，遏制文物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

刘玉珠同志听取发言后肯定了我市公安、文物等部门为侦破案件和严肃问责付出的努力，并提出五点意见：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为先的理念，强化文物安全红

线意识；二是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要求，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文物安全大排查；三是要营造声势，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文物犯罪；四是要加强职业道德和队伍建设，严格责任追究；五是要以安保工作为抓手，进一步夯实文物保护基础。

王宁同志要求全市认真落实刘玉珠局长的指示，深刻剖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全市文物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文物安全工作的使命感；二是认真总结汲取明十三陵文物被盗窃的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做好文物安全工作的紧迫感，要剖析原因、吸取教训、专项排查整改安全隐患、完善安全设施、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三是紧紧抓住文物安全工作这一重点，努力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抓紧做好核心区、大遗址、通州路城的文物保护工作，全力推进“三个文化带”和中轴线申遗相关工作。

（市文物局文物监察执法队）

## 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训会举办

3月29

日，为推动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工作，由市文物局组织的“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培训会”在中



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22家北京地区的全国博物馆文创试点单位和市文物局所属19家文博单位近

百人参加培训。培训会从政策解读、产品开发工作，加强示范引领和品牌建设。以点带面，推动北京地区博物馆与首都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段勇司长出席并解读了文创相关政策。（市文物局文物市场处）

##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圆满收官



4月7日，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总结电视电话会议，王宁副市长代表北京市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在主场参会并作典型发言。首都博物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获“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集体”称号，北京市文博交流馆馆长兼书记薛俭、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科长吴英茂获“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先进个人”称号。

2012年至2016年，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开展了第

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目前普查工作全面完成，实现既定目标，取得丰硕成果，初步实现摸清家底、建立机制、服务社会的三大目标，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

平台共登录国有可移动文物单位11162家，国有可移动文物6407余万件。其中，北京市登录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326家，登录国有可移动文物501余万件，居全国第一位。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对普查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充分肯定了此次普查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指出通过普查全面提升了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和水平。同时，刘延东副总理强调各级党和政府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升对文物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定做好文物工作的决心。

（市文物局博物馆处）

## 口述：雄安新区及周边的文物情况

今天谈这个问题，也是受到中央设立雄安新区的启发。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的同志曾经找我，希望到天津和河北一带调查震后留下的痕迹。我记得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时，我和地震所所长或者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我们一起去进行了调查。所以我去过那一带，有了一些回忆。

发掘琉璃河遗址的时候，河北的同志就开玩笑说，那还是我们河北的地方呢，只是现在属于北京的辖区。而且不单纯是在考古上，在很多方面和北京有着联系，比如房山和涿县，还有京东和河北、天津的一些地方，因为京津冀都是太行山左的地区，我也很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首都博物馆曾经搞过京津冀出土文物的展览，我认为除此以外，对地上不可移动文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探讨。比如说我在首都图书馆讲“外国名人在北京留下的足迹”时曾提到，我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审稿的时候忽然看到一条关于白塔寺设计师阿尼哥的记载，阿尼哥的材料比较少，除了《凉国公慧敏公神道碑》和白塔寺，现在连阿尼哥埋在哪里，只有文字描述而没有具体地点，《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的记录，就很珍贵。

我想，雄县、安新、容城是冀中，与北京、保定、天津都是比较等距的，白洋淀也在周边，白洋淀是华北的一个“肾”，这是对生态非常重要。另外抗日战争时期的雁翎队也在此处活动。

我们不是说“赶时髦”，而是说文物工作在城市规划之前，就要做相关考虑。目前京津冀更多的是在博物馆和考古上有所联系，但是从文物的多样性、人物、地理等方面内在的关系，我觉得是日后需进一步发掘的内容。

北京在河北大地上，是其中的一小片，天津的区域面积也不是很大。而河北的文物类别，A—G类都很丰富，北京也都有这些类别，但是我们的文物等级有的没有那么高。我认为，除了我们能在博物馆展示的京津冀内在关系，我们在地面其他类别文物上做一些考察也是必要的。

我记得当时参与唐山地震考古，我们编出了《京津唐地震考古》一书，后来国家地震局地震研究所要再复核一下，于是我们到了天津，看了看望海楼、文庙等。后来又說再看看河北，挨着京津冀的地方，就到了雄县和永清。

河北冀中一带，古代的时候，是宋辽对峙的地方，这里的文物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很多地方都有地道，这就是当时老百姓创造出的

战争时期的防御措施。唐山地震后，我和地震所的同志去考察了雄县、永清之间的地道，看看有没有垂直裂缝。记得地道设计得很科学，墙上还有放灯碗的龛，地道里还有和深山联系的翻板，我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冉庄的地道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在拒马河畔，白沟一带，都有这样的建筑，北京张坊也有这样的地道。北京是在燕赵



宋辽边关古地道

我觉得河北的文物有它的特点，比如河北正定有半座唐代建筑，北京有唐代、金代的石塔，而没有木结构。还有天津蓟县观音阁，是辽代统和年间的建筑，而河北雄县、永清一带有辽代木结构建筑。永清县辽代的石塔形制，在北京也不多见。河北唐代石塔则在拒马河南岸涿县，另外河南林县也有，北京就是云居寺有七座。这就是共性，也许将来能够进行调查研究。

按照国家文物局的划定标准，文物分为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和考古发掘文物几类，在此我们介绍一下不可移动文物里面，雄安新区一带比较重要的。我从《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上找了一下——当然现在可能有新的发现，也可能有些文物已经没有了。不可移动文物里，A类是古遗址，B类古墓葬，C类古建筑，E类近代史迹，F类少数民族和外国风格近代建筑，G类为窖藏。

雄县A类有7项，首先是燕南长城雄县段——雄县、容城、安新三县都有燕南长城。中国历史上燕南长城是很重要的，燕南长城的时间比较早。C类中就有刚才提到的地道，还有古城址。另外他们有些碑比较重要，比如说界碑。河北有界碑，有了界碑就知道很多信息。北京也发现有界碑，上面有四至，时间是唐代开元十八年（730），这在全国也不多见。E类近代史迹的相关文物受到思想的影响，有些近代的东西当时可能不敢收录，比如与传教士有关的历史。我认为天主教的文物很重要，比如河北献县，元朝时就是天主教25个教区中的一个。而北京，元代汗八里是第25区，相关史迹在河北、宁夏都有。我们不是搞宗教，而是研究历史

文化，这些东西不要忌讳，而是去研究东西文化交流或外国侵略的史实，我们要认识这些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一些问题。

安新，也有雁南长城安新段。此外，A类12项，B类12项，C类6项，D类4项，E类4项，F类1项。安新县有“古秋风台”——中国古代有一种崇尚，把当地的风景区列为一组，北京、河北、陕西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昌平有“昌平八景”，通州有“通州八景”。当然北京“燕京八景”中的“居庸叠翠”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都还在。另外就是《抗苇席税》碑值得注意，白洋淀出苇子，于是就把手编成苇席，这是一块古代抗拒交税的碑。

容城，A类22项，也有燕南长城。B类也有一点，比如石像。C类收的不多，D有3项，E、F各有1项。另外这些地方也是名人荟萃的地方，也被曾经被名人关注过，比如白洋淀，著名作家孙犁描绘过，我们都学过他的文章。各地都有景色，这三个地方离这些风景区不远，都可以发展，可以说是京畿的胜景，比较重要。

另外还有杨继盛，也就是明代嘉靖时候被杀的杨椒山，是容城县的名人。这样一来，宣武门外的杨椒山祠也就和容城产生了联系。还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是我们的老师，是高阳县人，高阳县也挨着白洋淀。上世纪30年代，苏先生曾经在陕西宝鸡发掘斗鸡台，没有钱了，派西北考察团的人回到高阳县（他家祖辈是织布的），要了钱让人带回来，使得斗鸡台的发掘没有间断。我觉得我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很值得敬佩，应该宣传。河北省的考古学家，著名人物还有很多，诸如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还有胡厚宣先生。我们考古界的人物，已经作古，盖棺论定了，我们也要宣传他们。我们宣传法海寺的冰川擦痕时，就要宣传李四光。那么宣传河北容城，未尝不可说说杨椒山。重要的人物，可以发掘的东西是很多的。

另外历史人物，还有孙连仲，雄县人，是抗日将领，和佟麟阁、张自忠等那个年代的人物都曾在这一带活动。白洋淀附近还有杨成武活动的事迹，他是我党很有名的人物。

所以说这些内容在于我们去发掘，我觉得我们提出“三个文化带”，实际都与河北、天津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大西山是太行山、燕山、军都山，也就是和河北有关。

有一次考察沿河城长城，我们到了河北一个叫孔涧的地方。农民看到我们去考察，拿来了小箭头，还有错金银的提梁，可以说河北的文物多的都来不及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就有三大本。我们依傍着河北的宝地，联合搞京津冀考古，应该说还是有优势的。

我举个例子，比如张家口、宣化、蔚县，都和北京有关系，明朝英宗就被掳到蔚县。崇礼有很多长城，张家口、宣化都是重要的长城修建地。这三个县是属于冀中，燕赵慷慨悲歌之地，是出英雄的地方。另外康熙视察河工，比较重视治理水利，在白洋淀附近现在恢复了行宫的遗址。

（吴梦麟先生口述，《北京文物》编辑部整理）

##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活动，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等。

◆投稿邮箱为：[bjwwb2005@126.com](mailto:bjww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 『甲骨文记忆』展 对儿童互动体验式学习的启发

在博物馆的观众中，儿童及青少年所占的比重较大。青少年的博物馆参观行为多是学校主导的、有计划的参观。而儿童的参观则是在家长带领下，无意识的、不自觉的参观。如何才能吸引儿童关注展览，激发其学习兴趣，在寓教于乐的状态下，轻松地玩、快乐地学，是我们博物馆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5年10月举办了“甲骨文记忆”展。该展览以丰富的馆藏甲骨实物、浅显易懂的文字描述、先进的多媒体互动设备等，吸引了众多观众。在2016年举办的“第十三届（201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中榜上有名。现就该展览是如何启发儿童体验式学习的进行介绍。

**一、甲骨占卜的多媒体互动**  
“甲骨文记忆”展最具特色的部分就是序厅中模拟占卜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区。该区域让儿童体验到占卜的具体过程，从而加深对占卜的认识。

甲骨文记录的内容多与占卜相关。儿童很难理解占卜的内涵及其程序。因此，展览在序厅以多媒体互

绍为法海寺的过街塔，误导大众，以至今日，仍有人还在错误引用。然而却因塔毁而成为了遗憾，今人多未见其真容，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关于北法海寺过街塔，周肇祥和林徽因都有过描述。民国五年（1916）周肇祥往游法海寺时说：“有门，白塔峙其上，额曰：‘敕建法海禅寺’，后番书‘吨巴得摩乌室尼渴毕麻利啤诶吨’，塔砖筑，基七层，法海寺在山脊上，其上书：法海寺，元至元元年建，明正统中修，顺治十七年重修。”

据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香山南为门头村，村后为万安山……法海寺、法华寺在万安山，二寺前后连属，相传为弘教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修建。”而于敏中在《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还特别提到了“……改今名，前为法海寺，门上有小塔。”

对于北法海寺，梁思成先生以建筑师独到的眼光来审视过街塔，特别指出：“（该寺）本身在山坡上，寺门却在寺前一里多远的山坡底下。”林徽因也对这座塔的价值评价很高：“法海寺门特点却并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却是他（它）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发现。”

法海寺过街塔因梁思成、林徽因的照片而被世人关注，成为京华名塔，又因当年梁思成留下的北法海寺过街塔旧照，并没有注明这是北法海寺还是南法海寺，因此，多年以来，凡是介绍石景山的翠微山法海寺时，皆会将已毁的北法海寺过街塔“张冠李戴”介

绍为法海寺的过街塔，误导大众，以至今日，仍有人还在错误引用。然而却因塔毁而成为了遗憾，今人多未见其真容，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关于北法海寺过街塔，周肇祥和林徽因都有过描述。民国五年（1916）周肇祥往游法海寺时说：“有门，白塔峙其上，额曰：‘敕建法海禅寺’，后番书‘吨巴得摩乌室尼渴毕麻利啤诶吨’，塔砖筑，基七层，法海寺在山脊上，其上书：法海寺，元至元元年建，明正统中修，顺治十七年重修。”

据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云：“香山南为门头村，村后为万安山……法海寺、法华寺在万安山，二寺前后连属，相传为弘教寺遗址，本朝顺治十七年修建。”而于敏中在《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还特别提到了“……改今名，前为法海寺，门上有小塔。”

对于北法海寺，梁思成先生以建筑师独到的眼光来审视过街塔，特别指出：“（该寺）本身在山坡上，寺门却在寺前一里多远的山坡底下。”林徽因也对这座塔的价值评价很高：“法海寺门特点却并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却是他（它）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发现。”

法海寺过街塔因梁思成、林徽因的照片而被世人关注，成为京华名塔，又因当年梁思成留下的北法海寺过街塔旧照，并没有注明这是北法海寺还是南法海寺，因此，多年以来，凡是介绍石景山的翠微山法海寺时，皆会将已毁的北法海寺过街塔“张冠李戴”介



展厅中的甲骨文占卜场景

绍为法海寺的过街塔，误导大众，以至今日，仍有人还在错误引用。然而却因塔毁而成为了遗憾，今人多未见其真容，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

关于北法海寺过街塔，周肇祥和林徽因都有过描述。民国五年（1916）周肇祥往游法海寺时说：“有门，白塔峙其上，额曰：‘敕建法海禅寺’，后番书‘吨巴得摩乌室尼渴毕麻利啤诶吨’，塔砖筑，基七层，法海寺在山脊上，其上书：法海寺，元至元元年建，明正统中修，顺治十七年重修。”

对于北法海寺，梁思成先生以建筑师独到的眼光来审视过街塔，特别指出：“（该寺）本身在山坡上，寺门却在寺前一里多远的山坡底下。”林徽因也对这座塔的价值评价很高：“法海寺门特点却并不在上述诸点，石造及其年代等等，主要的却是他（它）的式样与原先的居庸关类似，从前居庸关上本有一座塔，但因倾颓已久，无从考其形状，不想在平郊竟有这样一发现。”

法海寺过街塔因梁思成、林徽因的照片而被世人关注，成为京华名塔，又因当年梁思成留下的北法海寺过街塔旧照，并没有注明这是北法海寺还是南法海寺，因此，多年以来，凡是介绍石景山的翠微山法海寺时，皆会将已毁的北法海寺过街塔“张冠李戴”介

## 北法海寺过街塔旧影

在十三层相轮上，原有林徽因所说的“（刹顶）最顶尖上有仰月教徽”。对比照片：1.塔肚四面的壶门（俗称“眼光门”），壶门的券面为高浮雕图案，有灵蛇、番莲之属；2.刹顶上原有的仰月、宝珠皆已不知去向了；3.束腰部分所雕石狮还保存完好。

梁思成、林徽因所摄旧照塔座上有一棵柏树，林徽因说：“现在塔座上斜长着一棵古劲的柏树，为塔门增了不少的苍老，更像是做他的年代保证。”当年，林徽因就提出：“为塔门保存计，这种古树似要移去的，怜惜古建的人到了这里，真是彷徨不知所措。”本人所保存的图片中，过街塔上也有柏树。还有一幅为过街塔的全景，从图片上看，应该是从过街塔正面拍摄的，画面上左侧十个大坑，背后还有一栋四层的大楼，周边的环境应该是一个工地。有的资料提到，法海寺过街塔毁于“大跃进”时期，而这幅全景图中的过街塔券门左侧有白漆书写的“大学毛泽”，右侧的字看不清。有资料说北法海寺过街塔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拆除的，但从旧照来看，至少在“文革”中过街塔还存在。

张嘉鼎在《香山法海寺》中说：“1900年，法海寺毁于八国联军之手，八国联军将法海寺里的金佛和法器掠走，并将山上小白塔捣毁，原来他们以为塔门上的小佛是金佛，费力爬上一看是陶佛和石佛。”按张嘉鼎的说法，北法海寺过街塔上的佛龛中是陶佛和石佛，我以为，过街塔上并没有置陶佛，只有石佛。从我保存的照片来看，塔上佛龛中佛像的面部已经损毁了。

北法海寺的这几帧旧照，对北法海寺过街塔被拆的原因和被拆时间的探究是有帮助的。

（陈 康）



北法海寺过街塔全景

过街塔上并没有置陶佛，只有石佛。从我保存的照片来看，塔上佛龛中佛像的面部已经损毁了。

北法海寺的这几帧旧照，对北法海寺过街塔被拆的原因和被拆时间的探究是有帮助的。

（陈 康）



易县解村的燕长城城墙